

doi. 10. 3724/1005-0566. 20250618

增值税税率下调与企业稳岗扩岗

彭可人

(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运用税收政策支持各类主体履行稳岗扩岗社会责任是党中央、国务院的明确要求。以 2013—2023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使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考察增值税税率下调对企业劳动雇佣的影响。研究表明,增值税税率下调使得企业劳动雇佣规模增加了约 3.0%,相当于每家样本企业平均增加了 172 个就业岗位。进一步分析发现,增值税税率下调显著增加了研究生学历以及研发岗和管理岗的劳动力雇佣规模,雇佣结构整体呈现出以高素质、高技术人才为主的特点。机制分析发现,增值税税率下调通过增加企业经营性现金流和改善银行信贷获取两条路径增加企业雇佣规模。异质性分析发现,在税负转嫁难度较大、获取银行贷款难度较大以及数字技术密集型企业中,增值税税率下调的就业促进效应更明显。研究结果从企业劳动雇佣视角拓展了增值税改革的政策效应研究,为后续利用税制改革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提供了重要政策参考。

关键词:增值税改革;增值税税率下调;企业雇佣;雇佣结构

中图分类号:F97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566(2025)06-0191-13

VAT rate reduction and corporate employment absorption

PENG Keren

(School of Busines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whether value-added tax (VAT) rate reduction can affect the employment size of firms. Specifically, based on the data of Shanghai-Shenzhen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13 to 2023, this paper tests the effects of China's VAT rate reduction on the employment size of firms by using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design and the time-varying DID approach.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VAT rate reduction significantly promotes employment absorption by firms. The further study shows that the VAT rate reduction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the employment of workers with postgraduate degrees and workers in management and R&D positions. The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VAT rate reduction expands the employment of firms by increasing firm's operating cash flows and bank loans. The heterogeneity study shows that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VAT rate reduction and corporate employment is concentrated in digital firms and firms facing greater difficulties in transferring tax burden and acquiring bank loans. This paper contributes to the extant research on the effects of VAT reform and the growing literature on the determinants of corporate employment.

Key words: VAT reform; VAT rate reduction; corporate employment; employment structure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健全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并提出“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和抵扣链条”等具体举措,

收稿日期:2025-02-20 修回日期:2025-05-20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增值税改革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效应评估及对策建议研究”(24YBQ150)。

作者简介:彭可人(1995—),女,湖南长沙人,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讲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为财税政策与企业行为。

为新时代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近年来,作为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的关键举措,增值税改革的持续推进备受关注。其中,增值税税率下调构成了改革进程中最具影响力的政策工具,这一措施不仅被视为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发力点,而且是稳定市场预期、提振企业信心的关键支撑要素。“进一步优化增值税制度”是“十四五”规划提出的战略任务,强化宏观政策的民生导向是政府工作报告(2025)的重点内容,而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因此,深入研究增值税税率下调对企业吸纳就业的促进作用能够为后续运用税制改革引导企业主体稳岗扩岗、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提供重要的决策参考。

我国增值税制度的显著特征是多档税率并

存,这会导致企业间在抵扣环节上出现显著差异,造成中间投入价格扭曲和资源错配,最终引发生产率损失^[1-2]。为了完善增值税制度、保持税收中性,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分别于2017年、2018年和2019年简并、下调增值税税率,表1总结了这3次增值税税率下调的详细内容。现有关于增值税税率下调的政策效应研究主要从两个层面展开:一是宏观层面,学者重点关注税率下调的财政影响^[3]、减税效应^[4]、资本回报率^[5]和经济增长^[4];二是微观层面,包括税率下调对企业投资^[6]、盈余管理^[7]、企业创新^[8]和生产效率^[9]的影响以及税率下调的市场反应^[10]。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尚未涉及增值税税率下调对企业劳动雇佣的影响,更未涉及其中的机制路径剖析。

表 1 增值税税率下调历程

改革内容	一般纳税人适用税率	受影响业务或行业	实施时间	政策依据
取消 13% 的增值税税率,原适用 13% 税率的调整至 11%	改革前:17%、13%、11% 和 6% 改革后:17%、11% 和 6%	销售低税率货物 ^① (13%→11%)	2017 年 7 月 1 日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简并增值税税率有关政策的通知
原适用 17% 和 11% 税率的,税率分别调整为 16%、10%	改革前:17%、11% 和 6% 改革后:16%、10% 和 6%	销售一般货物和有形动产租赁服务(17%→16%);销售低税率货物以及提供“五大”服务 ^② (11%→10%)	2018 年 5 月 1 日	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
原适用 16% 和 10% 税率的,税率分别调整为 13% 和 9%	改革前:16%、10% 和 6% 改革后:13%、9% 和 6%	销售一般货物和有形动产租赁服务(16%→13%);销售低税率货物以及提供“五大”服务(10%→9%)	2019 年 4 月 1 日	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

此外,与本文相关的重要文献是增值税改革对企业劳动雇佣行为的影响研究。税制改革对企业劳动雇佣的影响是长久以来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关于增值税改革的劳动雇佣效应研究,目前尚未达成统一结论。现有文献主要聚焦于3次增值税改革:增值税转型(由生产型转向消费型)、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以下简称“营改增”)和增值税留抵退税改革。前两项改革允许抵扣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打通行业间抵扣链条,旨在解决重复征税问题。然而,由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间的复杂关联以及生产要素间的替代效应^[11-12],前两项改革对企业劳动雇佣的实际影响并不明确。增值税留抵退税改革缓解了企业资金被占用问题,显著增加了企业雇佣规模^[13-14]。上述文献为本文研

究奠定了重要基础,但关于增值税税率下调与企业劳动雇佣的研究尚无文献涉及,且税率下调和上述3次增值税改革的减税逻辑明显不同:税率下调通过简并税率档次和降低税率从而优化税率结构,直接减少企业增值税支出;增值税转型和“营改增”均属于完善抵扣机制,前者扩大了进项税额抵扣范围,后者打通了行业间抵扣链条;留抵退税完善了增值税返还链条,改善了企业的留抵税金被占用问题。增值税税率结构未来仍有较大优化空间,考察税率下调的政策效应对未来深化增值税税率改革具有重要的决策价值。

本文基于2013—202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使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考察了增值税税率下调对企业劳动雇佣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增

① 即与生产生活紧密相关的货物,如农产品、石油液化气、天然气、食用盐、电子出版物等。
② 该“五大”服务涉及建筑安装业、基础电信业、房地产业、邮政业和运输业。

增值税税率下调促使企业的雇佣规模增加了约3.0%,相当于每家企业平均扩大172个就业岗位。区分劳动雇佣结构的进一步分析发现,增值税税率下调显著增加了研究生学历以及研发岗和管理岗的劳动力雇佣规模,劳动雇佣结构整体呈现出以高素质、高技术人才为主的特点。机制分析发现,增值税税率下调通过增加企业经营性现金流和改善银行信贷获取促使企业扩大雇佣规模。异质性分析发现,增值税税率下调对企业劳动雇佣的促进效应在税负转嫁难度较大、获取银行贷款难度较大以及数字技术密集型企业中更明显,上述结果既间接验证了本文机制分析的合理性,又与增值税税率下调与企业雇佣结构的分析结果相契合。

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第一,本文首次考察了增值税税率下调对企业劳动雇佣的影响,为税收激励与劳动雇佣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纵观已有文献,大量学者遵循西方研究范式,将研究重点集中在企业所得税^[15-17],忽略了中国增值税在税收收入体系中占主体的制度背景,对增值税和企业劳动雇佣的关注较少。本文填补了增值税税率下调与企业劳动雇佣研究领域的空缺,拓展了增值税影响企业行为的相关学术研究。第二,本文剖析了增值税税率下调促进企业增加劳动雇佣的作用机理并提供了经验证据。厘清作用机理有助于深入理解宏观财税政策和微观企业行为之间的传导机制,本文从内部现金流和外部融资两个层面验证了增值税税率下调促进企业增加劳动雇佣的作用机理,为后续利用税制改革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提供了可行路径。第三,本文为增值税税率下调的政策效应提供了直接的经验证据,为后续增值税改革的政策优化和落实奠定了坚实基础。增值税改革成效的检验是增值税制度持续完善的重要基础,是提高改革质量、优化改革效果的必然要求。本文从企业劳动雇佣角度验证了增值税改革的有效性和必要性,为后续利用税制改革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提供了重要政策参考。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资金是企业进行投资决策时的关键限制因素,

对于满足企业雇佣需求而言极为重要^[18-19],低成本、易于获取的外部资金有助于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增加投资,从而增加企业的劳动力需求^[20-21]。然而,中国企业普遍面临较为严重的融资约束^[14],加之企业人力资本相比于实物资产而言具有明显的专有性和不可抵押性,使得企业的劳动雇佣行为更容易面临融资约束的困境。现有研究表明,融资约束会显著抑制企业劳动雇佣^[22-23],而当融资约束缓解时,企业劳动雇佣会恢复增长^[24]。这表明,企业在劳动力雇佣决策过程中面临一个关键矛盾:一方面,雇佣需求高度依赖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外部融资渠道往往难以充分满足其劳动力扩张需求,因此内部资金在企业雇佣决策中扮演替代性重要角色。充沛的内源现金流能够成为弥补企业外源融资不足、保障企业劳动雇佣顺利进行的重要资金来源。

企业税费负担构成其经营性现金流的关键支出项目,增值税税率下调将直接影响企业的增值税税负,从而可能通过两个渠道对企业雇佣决策产生积极影响:一是增值税支出的减少可直接改善企业的可支配现金流;二是经营现金流状况的改善为企业扩大劳动雇佣规模给予了必要的资金保障。

在完善的增值税抵扣机制下,理论上各环节的增值税税负能够通过价格传导机制完全转嫁给最终消费者,从而使企业实际承担的税负保持中性。在此种情形下,增值税税率的调整不会改变企业的净收益水平,进而不会对其经营决策产生实质性影响。然而,现实经济环境中存在诸多因素会打破这种理想状态,使得增值税政策的变化可能对企业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由于商品需求价格弹性的作用,企业难以将增值税税负完全转移给最终消费者,导致其必须自行消化部分税收负担。学术界已围绕上述主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诸多研究表明,税负转嫁往往具有不完全性:税收负担实际上会在供需双方之间进行重新分摊,而分摊比例主要取决于特定商品的供给弹性与需求弹性特征^[25]。Kosonen^[26]针

对理发业的研究发现,尽管增值税率由 22% 降至 8%,但消费者仅享受了 6% 的价格优惠。尹恒等^[27]研究表明,企业利用定价机制向下游客户或终端客户转移税收成本的效果较为有限。此外,以增值税为计税依据的关联性税费同样会对企业的资金流产生显著影响。最后,企业需实际承担在特定交易情形下(包括视同销售、坏账损失及赊销垫付等业务活动)发生的增值税。具体而言,在第一、二类业务场景中,虽然企业已按规定确认销项税额,但无法从交易对方取得对应的现金回流,而在赊销垫付情况下,企业实际可支配的资金由于货币时间价值的存在而减少。

基于前述研究结论,增值税对企业经营决策具有显著影响,税率调整必然会改变企业的经营策略。由于增值税采用环环相扣的征收机制,税率下调将同时作用于销项端和进项端,使得最终应纳税额的变动方向存在多种可能。为阐明税率下调如何通过双重渠道(销项税额与进项税额)共同影响企业应纳税额,下文将通过具体案例展开分析。

假设某企业实现不含税销售收入 1 000 万元,同期发生不含税采购支出 450 万元^③,本文系统测算不同档次税率的企业在历次税率下调后的应纳税额。如表 2 所示,相较于基准情形(Panel A),经过 3 轮税率下调后(Panel D),多数企业的应纳增值税额显著下降,然而适用 6% 税率的企业却表现出税负上升的异常现象。究其原因在于:虽然这类企业的销项税率维持不变,但上游供应商适用税率下调导致其可抵扣进项税额减少。总体而言,增值税税率下调对企业的增值税支出产生了明显的降低效应,同时连带减少了增值税关联性税费和特殊销售业务中产生的增值税,最终带来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的增加,而经营活动现金流是企业进行劳动雇佣等投资最为重要的资金来源,因此增值税税率下调能够为企业雇佣提供重要的资金保障,促进企业增加雇佣。

表 2 企业应纳增值税额 单位:万元

Panel A:初始税率					
—		销项税率/%			
		17	13	11	6
进项税率 /%	17	93.5	53.5	33.5	-16.5
	13	111.5	71.5	51.5	1.5
	11	120.5	80.5	60.5	10.5
	6	143	103	83	33
Panel B:第一次税率下调					
—		销项税率/%			
		17	11	11	6
进项税率 /%	17	93.5	33.5	33.5	-16.5
	11	120.5	60.5	60.5	10.5
	11	120.5	60.5	60.5	10.5
	6	143	83	83	33
Panel C:第二次税率下调					
—		销项税率/%			
		16	10	10	6
进项税率 /%	16	88	28	28	-12
	10	115	55	55	15
	10	115	55	55	15
	6	133	73	73	33
Panel D:第三次税率下调					
—		销项税率/%			
		13	9	9	6
进项税率 /%	13	71.5	31.5	31.5	1.5
	9	89.5	49.5	49.5	19.5
	9	89.5	49.5	49.5	19.5
	6	103	63	63	33

此外,企业现金流状况的改善可能引致债权方信贷决策的调整。由于银行等金融机构通常将企业现金流作为重要授信评估指标,其贷款政策的变动必然会对企业的融资活动及雇佣决策产生连锁反应。在我国以银行为核心的金融体系架构下,银行信贷构成了企业雇佣扩张所需外部资金的主要供给渠道^[28]。现有研究证实,银行信贷政策收紧会显著抑制企业劳动雇佣规模^[28]。银行信贷决策过程中,金融机构通常会系统考察企业的盈利能力、现金流量状况等关键财务指标,据此审慎评估借款主体的债务履约能力及潜在违约概率,并据此确定合理的风险补偿水平。增值税税率下调后,企业增值税税负下降直接增加了经营性现金流状况,这一方面增强了债务偿还能力,另一方面降低了财务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从债权人视角来看,企业违约风险的下降意味着其投资风

③ 本文样本企业中间投入率的均值为 0.453,借鉴 Fang 等^[39]的做法,中间投入率 =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险降低,这可能会促使债权人调低风险补偿要求,扩大信贷投放规模,企业的外部融资约束得以缓解,资金可获得性的提升为其突破融资瓶颈创造了有利条件,从而为扩大雇佣规模提供了资金保障。

综合上述,增值税税率下调能够显著促使企业吸纳就业,其中的作用机制为增加企业的经营性现金流和银行信贷获取,故提出本文假设 H:限定其他条件,增值税税率下调能够促使企业增加雇佣。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 2013—2023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初始研究样本。以 2013 年为起始年是为了保证改革前后的观察期长度基本一致。进一步地,本文删除金融业企业、ST 和 *ST 公司以及相关数据缺失的样本。最终得到 36 353 个公司—年度观测值。上述筛选程序与现有文献基本一致^[10,29]。本文数据来自 RESSET 数据库和 CSMAR 数据库,各省份人口和工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上下 1% 的缩尾处理。

(二)模型构建与变量定义

本文构建如下多时点 DID 模型:

$$Lstaff_{it} = \alpha_0 + \alpha_1 Reform_{it} + \alpha_3 X_{it} + \mu_i + \gamma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式(1)中,被解释变量是企业劳动雇佣($Lstaff$),参考现有文献^[22,30]的主流做法,采用“期末员工人数的自然对数”进行衡量。

模型(1)中主要解释变量 $Reform$ 表示企业当年是否受增值税税率下调影响。通过对我国增值税改革历程的梳理可以发现,在历次税率调整中,6% 这一档税率始终保持不变。然而,考虑到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跨行业经营的特点,理论上单纯适用 6% 税率的上市公司数量应当极为有限。本文研究的样本统计结果进一步验证了这一推断,数据显示所有样本企业均涉及多个增值税税率档次,未发现仅适用 6% 税率的个体,这表明,税率下调政策最终覆盖了研究样本中的全部企业主体。因此,参考刘行等^[10]的研究,对于增值税税率中包含 13% 的企业,其 $Reform$ 变量在 2017 年及以后年度取 1,

反之取 0;考虑到 2018 年与 2019 年的税率下调涉及所有样本企业,将 $Reform$ 变量的赋值规则设定如下:对于除首次税率调整影响范围之外的企业,自 2018 年起该变量赋值为 1,在此之前赋值为 0。

模型(1)中的 X 表示一组公司和地区层面的控制变量,本文参考宋弘等^[30]、余明桂等^[18]的研究控制以下变量。①公司特征层面:公司规模($Size$),等于总资产的对数;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资产负债率(Lev);上市年限(Age);总资产报酬率(Roa)。②公司治理层面:董事会规模($Bsize$);高管薪酬(Pay);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③外部环境层面:地区人口规模($Lpop$),等于企业所处省份人口数量的对数;地区工资水平($Lwage$),等于企业所处省份职工平均工资的对数。

模型(1)中, μ 表示个体固定效应; γ 表示时间固定效应; ε 为随机干扰项,对标准误进行公司层面的聚类调整。

三、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 3 报告了描述性统计结果。在被解释变量方面,企业劳动雇佣($Lstaff$)的均值为 7.620,与余明桂等^[22]的研究接近,标准差为 1.269,说明不同企业的劳动雇佣规模差异较大。在解释变量方面,增值税改革变量($Reform$)的均值为 0.669,说明样本中有 66.9% 的观测值受到增值税税率下调的影响。

表 3 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样本量
$Lstaff$	7.620	1.269	4.466	7.548	11.130	36 353
$Reform$	0.669	0.471	0.000	1.000	1.000	36 353
$Size$	22.282	1.306	19.714	22.095	26.311	36 353
Lev	0.433	0.212	0.059	0.420	0.967	36 353
Roa	0.027	0.078	-0.369	0.032	0.199	36 353
$Growth$	0.148	0.434	-0.643	0.084	2.732	36 353
Age	12.135	7.913	2.000	10.000	34.000	36 353
$Bsize$	2.106	0.197	1.609	2.197	2.639	36 353
Pay	14.578	0.703	12.859	14.557	16.547	36 353
$Top1$	0.329	0.146	0.081	0.304	0.726	36 353
$Lpop$	8.590	0.649	6.544	8.741	9.450	36 353
$Lwage$	11.432	0.379	10.663	11.442	12.343	36 353

(二)研究假设的实证检验

模型(1)的回归结果列示于表 4。列(1)和列(2)使用普通 OLS 回归,列(3)和列(4)使用年度—公司双向固定效应回归。其中,列(1)和列(3)仅控

制公司层面特征,列(2)和列(4)进一步控制了地区层面特征。结果显示:无论如何设置回归模型和控制变量,*Reform*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以列(4)为例,当控制双向固定效应和全部控制变量时,*Reform* 的系数为 0.029 6,这意味着企业在增值税税率下调后劳动雇佣增加了 3.0% ($e^{0.029\ 6} - 1$),已知本文样本期间企业的平均雇佣人数为 5 743 人,相当于增值税税率下调使得每家企业平均增加了 172 个 ($5\ 743 \times 3.0\%$) 就业岗位,具有显著的经济意义,本文假设 H 得证。

表 4 增值税税率下调与企业劳动雇佣

变量	(1)	(2)	(3)	(4)
	<i>Lstaff</i>			
	普通 OLS		双向固定效应	
<i>Reform</i>	0.181 8 *** (6.394)	0.176 9 *** (6.287)	0.030 5 *** (2.791)	0.029 6 *** (2.705)
<i>Size</i>	0.737 6 *** (63.319)	0.740 9 *** (63.751)	0.656 7 *** (42.759)	0.656 7 *** (42.627)
<i>Lev</i>	0.435 9 *** (7.195)	0.395 3 *** (6.569)	0.197 4 *** (3.902)	0.197 1 *** (3.897)
<i>Roa</i>	0.818 5 *** (8.010)	0.749 5 *** (7.397)	-0.118 9 ** (-2.042)	-0.116 4 ** (-2.002)
<i>Age</i>	-0.003 9 ** (-2.458)	-0.003 3 ** (-2.056)	-0.041 2 *** (-17.175)	-0.060 5 *** (-5.557)
<i>Growth</i>	-0.088 3 *** (-7.805)	-0.086 8 *** (-7.697)	0.020 5 *** (2.981)	0.020 7 *** (3.016)
<i>Top1</i>	0.453 9 *** (5.992)	0.483 4 *** (6.414)	0.078 6 (0.819)	0.082 3 (0.855)
<i>Bsize</i>	0.278 5 *** (5.576)	0.279 0 *** (5.557)	0.109 1 *** (3.407)	0.109 5 *** (3.425)
<i>Pay</i>	0.125 4 *** (7.267)	0.133 9 *** (7.708)	0.055 5 *** (4.872)	0.055 5 *** (4.865)
<i>Lpop</i>	—	0.097 7 *** (4.856)	—	-0.027 5 (-0.261)
<i>Lwage</i>	—	-0.176 0 *** (-3.522)	—	0.234 8 * (1.818)
常数项	-10.995 1 *** (-38.490)	-10.105 1 *** (-15.141)	-7.662 1 *** (-20.828)	-9.870 4 *** (-6.857)
样本量	36 353	36 353	36 353	36 353
组间 R^2	0.654	0.659	0.452	0.452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	—
年度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公司固定效应	—	—	是	是

注:***、**、* 分别表示在 $p < 0.01$ 、 $p < 0.05$ 与 $p < 0.1$ 时有统计学意义;括号内为 t 值。下同。

(三) 稳健性检验

1. 平行趋势检验

采用双重差分法的重要前提是满足平行趋势假设,本文以增值税税率下调前最早一年为基期,采用事件研究法检验了增值税税率下调对企业劳

动雇佣的动态效应。如图 1 所示,在改革之前各年份虚拟变量的估计系数在统计意义上均不显著,且系数大小没有明显的事前趋势,满足事前平行趋势假设;增值税税率下调对企业劳动雇佣的促进效应在改革后立即显现,并且随着改革的推进不断增强。事件分析法的结果进一步支撑了前文采用多期 DID 法得出的基本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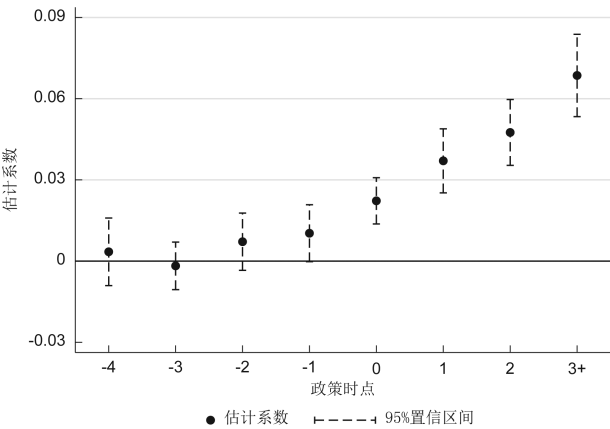


图 1 平行趋势检验

2. 排除同期增值税改革影响

与增值税税率调整同期实施的留抵退税政策以及“营改增”改革,同样可能对企业现金流量产生显著影响,进而作用于其雇佣决策。因此,本文的研究结论可能受到这些并行政策因素的干扰。本文采用以下处理方式以有效控制此类问题:首先,依据财税[2018]70 号《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 2018 年退还部分行业增值税留抵税额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文件规定,留抵退税政策的试点范围涵盖装备制造等先进制造业及研发等现代服务业共计 18 个大类行业(见表 6),在剔除这些试点行业样本后,对基准模型(1)重新分析;其次,剔除同期“营改增”试点行业样本后对模型(1)执行回归。结果展示于表 5 列(1)和列(2),*Reform* 的系数显著为正,结论依然成立。

3. 替换企业劳动雇佣的度量方式

本文借鉴崔小勇等^[13]的研究,使用“(年初职工人数 + 年末职工人数)/2 的自然对数”衡量企业劳动雇佣(*Lstaff_1*)。回归结果列示于表 5 列(3),结果显示,*Reform* 的系数依然显著为正。

表5 稳健性检验

变量	(1)	(2)	(3)
	<i>Lstaff</i>		<i>Lstaff_1</i>
	排除“营改增”影响	排除留抵退税影响	替换劳动雇佣度量方式
<i>Reform</i>	0.028 0 ** (2.493)	0.026 7 * (1.839)	0.032 8 *** (3.163)
<i>Size</i>	0.658 9 *** (41.183)	0.654 7 *** (32.042)	0.628 0 *** (41.684)
<i>Lev</i>	0.242 9 *** (4.730)	0.167 5 ** (2.394)	0.228 6 *** (4.634)
<i>Roa</i>	-0.133 3 ** (-2.188)	-0.043 4 (-0.527)	-0.196 0 *** (-3.498)
<i>Age</i>	-0.059 4 *** (-5.455)	-0.067 6 *** (-4.449)	-0.059 2 *** (-5.515)
<i>Growth</i>	0.018 9 ** (2.501)	0.008 5 (0.955)	-0.074 2 *** (-11.587)
<i>Top1</i>	0.142 3 (1.386)	0.050 0 (0.410)	0.025 5 (0.275)
<i>Bsize</i>	0.084 8 *** (2.613)	0.128 4 *** (2.849)	0.096 0 *** (3.012)
<i>Pay</i>	0.053 4 *** (4.576)	0.046 5 *** (3.047)	0.040 4 *** (3.540)
<i>Lpop</i>	0.012 7 (0.119)	-0.063 0 (-0.435)	-0.017 1 (-0.160)
<i>Lwage</i>	0.219 1 * (1.705)	0.296 5 (1.637)	0.285 0 ** (2.233)
常数项	-10.008 4 *** (-6.767)	-9.992 1 *** (-5.226)	-9.653 9 *** (-6.728)
样本量	33 389	20 646	36 353
组间 <i>R</i> ²	0.467	0.433	0.459
年度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公司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表6 2018年退还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行业目录

行业名称 (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统计)	行业代码 (2012年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C26
医药制造业	C27
化学纤维制造业	C28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C30
金属制品业	C33
通用设备制造业	C34
专用设备制造业	C35
汽车制造业	C36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C37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C38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C39
仪器仪表制造业	C40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I64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I65
研究和试验发展	M73
专业技术服务业	M74
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M75
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	N77

4. 安慰剂检验

本文参照 Cornaggia 等^[31]的研究方法,对 *Reform* 变量进行了 1 000 次随机赋值实验,通过观察 *t* 统计量的分布特征来验证处理效应的稳健性。理论上,若处理效应具有唯一性,则在变量随机分配后不应出现与实际 *Reform* 变量相同程度的显著性水平。图 2 呈现的安慰剂检验结果证实了这一推断。图 2 所示的核密度函数图展示了 1 000 次随机化测试的 *t* 统计量分布特征。实证结果显示,随机化处理后的 *t* 值呈现出以零点为中心的对称分布形态,且绝大多数模拟结果均未能达到基准回归的显著性水平,即所有模拟样本均未产生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处理效应,从而排除了遗漏变量导致研究结论的可能性,为本文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提供了有力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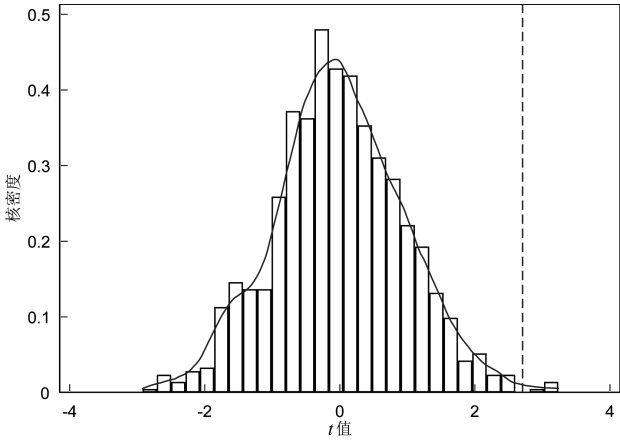


图2 随机化 *Reform* 取值的安慰剂检验

注:图中虚线为模型(1)中 *Reform* 变量的真实 *t* 值。

5. 考虑异质性处理效应

由于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各组接受处理的时间不一致,不同组别之间可能会互为对照组,由此估计出来的处理效应会有一定偏误^[32]。本文首先判断由不同组别之间互为对照组所带来的偏误大小。具体而言,可将样本分为 3 组:一是在样本期开始前就已经接受处理的组别(不变处理组);二是在样本期内逐渐接受处理的组别(时变处理组),包括早期处理组与晚期处理组;三是在样本期内始终未接受处理的组别(控制组)。本文样本中不存在不变处理组和控制组。在上述组别中,最容易导致异质性处理效应的是“晚期处理组 VS.

早期处理组”,因此晚期处理组与早期处理组之间的处理效应在所有处理效应中所占的权重越大,说明多时点 DID 估计产生的偏误越大。本文采用 Bacon 分解法对处理效应进行分组计算。由于分解要求数据为平衡面板数据,因此本文仅保留在 2013—2023 年均存续的样本企业。表 7 的 Panel A 展示了各组处理效应的权重。结果显示,晚期处理组与早期处理组之间的处理效应所占权重为 10.29%,说明异质性处理效应所带来的偏误对本文的回归结果影响有限。不过,为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起见,本文进一步排除异质性处理效应对本文结果的干扰。本文借鉴 Cengiz 等^[33]使用堆叠 DID 方法进行检验。表 7 的 Panel B 结果显示, *Reform* 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异质性处理效应并不会对本文基准模型的估计结果产生显著影响。

表 7 异质性处理效应检验

Panel A: Bacon 分解		
处理效应	估计系数	权重
总处理效应	0.024 9 ** (2.229)	1
早处理组与晚处理组	0.026 3	0.897 1
晚处理组与早处理组	0.013 7	0.102 9
Panel B: 堆叠 DID 方法的估计结果		
变量	<i>Lstaff</i>	
<i>Reform</i>	0.025 7 ** (2.304)	
控制变量	是	
公司/年度固定效应	是	
样本量	40 392	
组间 R^2	0.249	

(四)进一步分析:劳动雇佣结构

增值税税率下调显著促进了企业增加劳动雇佣。进一步地,本文试图探究增值税税率下调增加了何种类型的劳动雇佣,以体现企业的劳动雇佣结构在改革前后的变化。融资约束会导致企业减少雇佣高质量员工,或者雇佣更多低质量的员工替代,从而扭曲了企业内部的劳动力配置效率^[34]。增值税税率下调通过增加企业的经营性现金流和银行信贷获取改善了企业的资金状况,减少了企业最优劳动配置受到的资金约束,因此企业可能减少用低成本劳动力代替高成本劳动力的低效率劳动雇佣行为,雇佣更多的高质量员工以提升企业竞争力。具体而言,本文将从劳动学历和劳动力岗位两个方面予

以细化。值得注意的是,为了控制企业技术水平提高(例如数字化和智能化水平)对岗位需求变化的影响,本文在针对企业劳动力岗位的细化分析中加入企业数字化水平(*Digit*)这一控制变量,借鉴赵胜利等^[35]的做法,使用企业无形资产中数字化无形资产所占的比例衡量企业数字化水平。表 8 中回归结果显示:从学历细分来看,增值税税率下调显著增加了研究生学历的劳动力雇佣规模;从岗位细分来看,增值税税率下调显著增加了研发岗和管理岗的劳动力雇佣规模。以上结果表明,增值税税率下调后企业在吸纳就业时表现出对高学历人群的青睐,与之对应地,对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要求较高的岗位雇佣规模显著增加,劳动雇佣结构整体呈现出以高素质、高技术人才为主的特点。

(五)作用机制分析

增值税税率下调显著促进了企业增加劳动雇佣,本文将进一步验证增加经营性现金流和改善银行信贷获取这两种作用机制。

首先,本文验证增值税税率下调促进企业增加雇佣的第一条路径——增加经营性现金流。本文使用“经营性净现金流除以总资产(*OCF*)”衡量企业的内源现金流状况,*OCF* 值越大,表示企业的现金流状况越好。本文先检验增值税税率下调对企业经营性净现金流的直接影响,再以企业在增值税税率下调实施前一年(即 2016 年)的内源现金流状况为分组依据对全样本进行分组回归,当企业 2016 年的 *OCF* 值小于当年样本中位数时定义为现金流状况较差组,否则为现金流状况较好组。如果企业的劳动雇佣在增值税税率下调后由于经营性现金流的改善而增加,那么应该能够观察到,税率下调对企业劳动雇佣的促进效应在原本现金流状况较差的企业中更明显。表 9 的机制分析结果显示,列(1)中 *Reform* 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增值税税率下调显著增加了企业的经营性现金流;列(2)和列(3)的分组回归结果显示, *Reform* 变量的系数在原本现金流状况较差的企业中更大且显著水平更高。综合可见,增值税税率下调通过改善企业经营性现金流、缓解内源融资约束促使企业增加雇佣的路径得以验证。

表 8 增值税税率下调与企业劳动雇佣结构

变量	(1)	(2)	(3)	(4)	(5)	(6)	(7)
	<i>Lstaff</i>						
	劳动力学历			劳动力岗位			
	本科以下	本科	研究生	研发	生产	销售	管理
<i>Reform</i>	-0.000 (-0.007)	-0.004 (-0.115)	0.105 *** (4.319)	0.102 *** (3.448)	0.009 (0.191)	0.070 (1.605)	0.117 ** (2.010)
<i>Size</i>	0.449 *** (13.927)	0.580 *** (18.959)	0.603 *** (26.142)	-0.073 *** (-2.682)	0.507 *** (10.259)	0.518 *** (14.641)	0.041 (0.926)
<i>Lev</i>	0.112 (1.168)	0.104 (1.183)	0.299 *** (3.925)	-0.553 *** (-6.587)	0.367 *** (2.580)	0.294 ** (2.466)	-0.380 *** (-2.704)
<i>Roa</i>	-0.390 *** (-3.325)	-0.278 ** (-2.260)	-0.149 * (-1.677)	-0.117 (-1.106)	0.089 (0.513)	-0.450 *** (-3.701)	-0.152 (-0.958)
<i>Age</i>	0.038 (1.199)	0.050 * (1.743)	-0.082 *** (-4.284)	0.027 (1.020)	-0.046 (-1.269)	-0.005 (-0.158)	-0.132 *** (-2.902)
<i>Growth</i>	-0.149 *** (-8.193)	-0.228 *** (-12.515)	-0.260 *** (-17.449)	0.035 ** (2.163)	-0.242 *** (-8.995)	-0.216 *** (-10.602)	-0.023 (-0.909)
<i>Top1</i>	0.011 (0.048)	0.344 * (1.727)	-0.174 (-1.211)	0.811 *** (5.305)	-0.297 (-1.118)	-0.357 (-1.476)	1.381 *** (5.259)
<i>Bsize</i>	0.025 (0.288)	0.230 *** (2.617)	0.113 ** (2.133)	0.110 (1.434)	0.061 (0.517)	0.076 (0.660)	0.101 (0.800)
<i>Pay</i>	0.189 *** (6.131)	0.091 *** (3.118)	0.033 (1.532)	0.036 (1.424)	-0.049 (-1.374)	0.025 (0.772)	0.124 *** (2.943)
<i>Lpop</i>	-0.162 (-0.493)	-0.160 (-0.505)	-0.033 (-0.189)	-0.414 * (-1.673)	-0.400 (-1.105)	0.438 (1.415)	-0.999 ** (-2.454)
<i>Lwage</i>	0.010 (0.025)	-0.023 (-0.064)	0.408 * (1.834)	-1.003 *** (-3.090)	0.549 (1.262)	0.425 (1.108)	-0.069 (-0.127)
<i>Digit</i>	—	—	—	-0.013 (-0.163)	-0.583 *** (-4.208)	-0.147 (-1.572)	-0.008 (-0.070)
常数项	-9.694 ** (-2.378)	-8.250 ** (-2.309)	-10.565 *** (-4.247)	15.912 *** (4.215)	-7.137 (-1.444)	-16.087 *** (-3.760)	8.970 (1.534)
样本量	36 045	36 045	36 045	29 000	29 000	29 000	29 000
组间 R^2	0.121	0.178	0.175	0.058	0.063	0.141	0.112
年度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公司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其次,本文验证增值税税率下调促进企业增加雇佣的第二条路径——改善银行信贷获取。由于银行贷款是企业雇佣行为的重要外部资金来源^[28],因此本文重点关注企业的银行借款融资(*Loan*),使用“(长期借款+短期借款)/总资产”予以衡量。本文先检验增值税税率下调对企业银行借款的直接影响,再以企业在增值税税率下调实施前一年(即2016年)的银行借款为分组依据对全样本进行分组回归,当企业2016年的*Loan*值小于当年样本中位数时定义为银行贷款状况较差组,否则为银行贷款状况较好组。如果企业的劳动雇佣在增值税税率下调后由于银行贷款状况的改善而增加,那么应该能够观察到,税率下调对企业劳动雇佣的促进效应在原本银行贷款状况较差的企业中更加明显。表10的机制分析结果显示,列(1)中*Reform*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增值税税率下调显著改善了企业的银行借款状况;列(2)和列(3)中的分组回归结果显示,*Reform*变量的系数在原本银行贷款状

况较差的企业中更大且显著水平更高。上述结果证明了增值税税率下调通过增加企业的银行贷款获取、缓解外源融资约束促使企业增加雇佣。

(六)异质性分析

首先,增值税税率影响企业行为的重要前提是增值税税负转嫁的不完全性,且影响程度可能因税负转嫁程度不同而存在差异;其次,改善银行贷款获取是增值税税率下调促进企业增加雇佣的重要渠道机制。因此考察增值税税率下调的政策效应在不同税负转嫁难度和获取银行贷款难度企业中的异质性有助于间接验证本文的理论机制;最后,本文试图通过探究增值税税率下调的政策效应在不同要素密集度企业中的异质性,以佐证前文企业雇佣结构在改革后整体呈现出以高素质、高技术人才为主的特点这一研究结论。

基于以上原因,本文将进一步从税负转嫁难度、获取银行贷款难度和要素密集度3个层面对增值税税率下调与企业劳动雇佣的关系予以细化。

表 9 作用机制之经营性现金流

变量	(1)	(2)	(3)
	OCF	Lstaff	
		现金流状况较差	现金流状况较好
Reform	0.005 4 ** (1.974)	0.027 4 * (1.929)	0.017 9 (0.990)
Size	0.000 6 (0.107)	0.619 9 *** (30.060)	0.697 5 *** (35.540)
Lev	0.010 7 (1.075)	0.197 0 *** (3.407)	0.172 6 *** (2.702)
Roa	0.188 1 *** (8.791)	-0.184 5 ** (-2.207)	-0.169 6 ** (-2.225)
Age	0.002 0 (0.799)	-0.036 9 *** (-3.153)	-0.076 4 *** (-4.598)
Growth	0.002 4 (0.898)	0.023 0 ** (2.349)	0.023 5 ** (2.324)
Top1	-0.000 5 (-0.026)	0.052 2 (0.474)	0.122 7 (0.969)
Bsize	-0.001 8 (-0.396)	0.078 7 ** (2.040)	0.099 9 ** (2.294)
Pay	0.008 3 *** (4.865)	0.044 9 *** (3.322)	0.071 4 *** (4.538)
Lpop	-0.004 8 (-0.303)	0.042 1 (0.377)	-0.175 7 (-1.154)
Lwage	-0.013 4 (-0.435)	0.062 6 (0.454)	0.353 0 * (1.802)
常数项	0.068 6 (0.159)	-7.627 3 *** (-5.081)	-10.956 5 *** (-5.018)
样本量	36 353	18 176	18 177
组间 R ²	0.025	0.484	0.442
年度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公司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表 10 作用机制之银行贷款获取状况

变量	(1)	(2)	(3)
	Loan	Lstaff	
		银行贷款状况较差	银行贷款状况较好
Reform	0.007 0 *** (2.899)	0.031 6 ** (2.097)	0.011 1 (0.690)
Size	0.015 8 *** (4.702)	0.627 5 *** (30.938)	0.672 3 *** (27.768)
Lev	0.387 4 *** (32.718)	0.041 9 (0.678)	0.234 8 *** (2.768)
Roa	-0.120 8 *** (-4.322)	-0.025 8 (-0.320)	-0.214 4 *** (-2.638)
Age	-0.003 4 (-1.414)	-0.056 7 *** (-3.880)	-0.054 0 *** (-3.663)
Growth	-0.004 9 *** (-3.778)	0.019 9 ** (2.063)	0.020 7 ** (2.147)
Top1	0.039 3 * (1.746)	0.059 2 (0.513)	0.156 3 (0.995)
Bsize	-0.008 9 (-0.935)	0.066 6 (1.586)	0.144 3 *** (3.244)
Pay	-0.007 0 *** (-3.452)	0.047 9 *** (3.334)	0.038 0 ** (2.404)
Lpop	0.008 7 (0.411)	0.049 1 (0.329)	0.054 1 (0.391)
Lwage	-0.009 2 (-0.330)	0.220 9 (1.267)	0.170 9 (1.005)
常数项	-0.200 8 (-0.644)	-9.389 7 *** (-4.828)	-10.178 6 *** (-5.220)
样本量	36 353	18 129	18 224
组间 R ²	0.249	0.410	0.419
年度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公司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1. 税负转嫁难度

当企业所销售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越大时,消费者对产品价格变化越敏感,企业以提高售价的方式将增值税税负转嫁给消费者的难度越大^[10],因而这类企业受增值税税率下调的影响程度越大,表现为从增值税税率下降中获利更多。值得注意的是,若考虑两类企业在税率下调后的产品价格下降幅度差异,产品需求价格弹性较大的企业似乎从增值税税率下降中获利更少,这是因为对于产品需求价格弹性较小的企业而言,其产品价格 in 税率下调后的下降幅度会小于产品需求价格弹性较大的企业,这意味着消费者能够更多地分享到产品需求价格弹性较大企业的税收收益,而难以分享到产品需求价格弹性较小企业的税收收益。但是,上述分析忽视了两类企业在商品价格下降后的需求增加幅度差异。具体而言,相较于产品需求价格弹性较小的企业,产品需求价格弹性较大企业的产品价格下降一个单位所带来的消费需求增加幅度会更大,由此产生的收益也更多。因此,产品需求价格弹性较大的企业从增值税税率下降中所获得的综合收益会大于产品需求价格弹性较小的企业^[10]。

本文借鉴刘行等^[36]的方法,使用企业的市场占有率(Market,即营业收入除以其所属行业的总营业收入)衡量企业的产品需求价格弹性。企业的市场占有率越高,意味着其产品竞争力越强,需求价格弹性越小,税负转嫁难度越小。本文预期,增值税税率下调对企业劳动雇佣的促进作用在产品需求价格弹性较大(即税负转嫁难度较大)的企业中更明显。表 11 的分组回归结果证实了上述预期,这说明对于税负难以转嫁、税负“痛感”较重的企业而言,改革纾解税负压力的效果更明显。

2. 获取银行贷款难度

融资约束是制约企业劳动雇佣行为的重要瓶颈,而银行贷款是我国企业的重要融资渠道。基于此,本文将考察企业获取银行贷款的难易程度是否会影响增值税税率下调促进企业劳动雇佣的实际效果。抵押担保能力是影响企业获取银行贷款的重要因素,固定资产是最常用的抵押物。本文参照刘行等^[37]使用“固定资产/总资产”衡量企业的抵押担保能力和获取银行贷款的难度(Ppe)。

本文预期,增值税税率下调对企业劳动雇佣的促进作用在获取银行贷款难度较大的企业中更明显。分组回归结果列于表 12。结果显示:企业所面临的银行借款难度越大,增值税税率下调对企业劳动雇佣的促进效应越明显,验证了增值税税率下调通过缓解银行贷款难度较大企业的融资约束进而促使其增加劳动雇佣。

表 11 异质性分析之税负转嫁难度

变量	(1)	(2)
	<i>Lstaff</i>	
	税负转嫁难度较大	税负转嫁难度较小
<i>Reform</i>	0.036 0 ** (2.570)	0.026 6 (1.408)
<i>Size</i>	0.602 3 *** (26.057)	0.660 6 *** (31.143)
<i>Lev</i>	0.114 7 (1.368)	0.282 9 *** (4.720)
<i>Roa</i>	-0.162 2 * (-1.659)	-0.188 9 *** (-2.845)
<i>Age</i>	-0.078 2 *** (-5.123)	-0.035 6 ** (-2.422)
<i>Growth</i>	0.000 2 (0.025)	0.050 9 *** (5.396)
<i>Top1</i>	-0.017 3 (-0.125)	0.203 4 (1.555)
<i>Bsize</i>	0.150 2 *** (3.079)	0.073 8 * (1.848)
<i>Pay</i>	0.049 3 *** (2.905)	0.048 1 *** (3.410)
<i>Lpop</i>	0.128 8 (0.819)	-0.148 4 (-1.161)
<i>Lwage</i>	0.473 7 *** (2.622)	-0.031 9 (-0.183)
常数项	-12.178 4 *** (-6.087)	-6.152 0 *** (-3.134)
样本量	18 176	18 177
组间 <i>R</i> ²	0.371	0.449
年度固定效应	是	是
公司固定效应	是	是

3. 要素密集度

进一步地,本文试图探究增值税税率下调的政策效应在劳动密集型和数字技术密集型企业中是否存在异质性。关于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定义,本文借鉴鲁桐等^[38]的分类方法;关于数字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定义,本文参考国家统计局出台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如果企业所属行业属于上述文件中界定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则定义为数字技术密集型企业,具体分类标准见表 13。分组回归结果列于表 14。结果显示:*Reform* 的系数在数字技术密集型企业中显著为正,表明增值税税率下调对数字技术密集型企业劳动雇佣的促进效应更明显,这与前文增值税税

率下调与企业雇佣结构的分析结果相契合。

表 12 异质性分析之获取银行贷款难度

变量	(1)	(2)
	<i>Lstaff</i>	
	获取银行贷款难度较大	获取银行贷款难度较小
<i>Reform</i>	0.024 2 * (1.946)	0.004 1 (0.221)
<i>Size</i>	0.681 2 *** (32.153)	0.675 1 *** (32.071)
<i>Lev</i>	0.134 9 ** (2.324)	0.151 3 ** (2.349)
<i>Roa</i>	0.000 6 (0.008)	-0.231 3 *** (-2.982)
<i>Age</i>	-0.053 9 *** (-3.897)	-0.044 4 *** (-3.028)
<i>Growth</i>	0.013 2 (1.415)	0.038 4 *** (4.452)
<i>Top1</i>	-0.047 5 (-0.439)	0.158 1 (1.100)
<i>Bsize</i>	0.034 2 (0.937)	0.087 7 * (1.922)
<i>Pay</i>	0.027 6 ** (2.090)	0.081 5 *** (5.167)
<i>Lpop</i>	-0.006 1 (-0.047)	0.078 5 (0.532)
<i>Lwage</i>	0.150 1 (0.907)	0.087 0 (0.504)
常数项	-8.898 3 *** (-4.851)	-10.212 8 *** (-5.167)
样本量	18 129	18 224
组间 <i>R</i> ²	0.482	0.462
年度固定效应	是	是
公司固定效应	是	是

表 13 基于要素密集度的行业分类

行业类型	行业名称 (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统计)	行业代码 (2012 年证监会 上市公司行业分类)
劳动 密集型	农林牧渔业	A
	采掘业	B
	农副食品加工业	C13
	食品制造业	C14
	纺织业	C17
	纺织服装、服饰业	C18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C19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C20
	家具制造业	C21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D
	建筑业	E
	批发和零售业	F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G
数字技术 密集型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C38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C39
	仪器仪表制造业	C40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I
	广播、电视、电影和影视录音制作业	R86

表 14 异质性分析之要素密集度

变量	(1)	(2)
	<i>Lstaff</i>	
	劳动密集型	数字技术密集型
<i>Reform</i>	0.024 9 (1.124)	0.090 4 *** (3.047)
<i>Size</i>	0.663 0 *** (20.759)	0.703 4 *** (25.660)
<i>Lev</i>	0.126 3 (1.148)	0.273 6 *** (3.016)
<i>Roa</i>	-0.074 8 (-0.561)	-0.123 8 (-1.336)
<i>Age</i>	-0.077 6 *** (-3.562)	-0.063 1 ** (-2.464)
<i>Growth</i>	0.013 0 (0.919)	0.034 4 ** (2.245)
<i>Top1</i>	0.268 2 (1.533)	0.238 3 (1.245)
<i>Bsize</i>	0.142 0 ** (1.984)	0.069 8 (1.259)
<i>Pay</i>	0.009 6 (0.373)	0.083 8 *** (3.591)
<i>Lpop</i>	-0.031 5 (-0.148)	-0.260 7 (-1.309)
<i>Lwage</i>	0.396 0 (1.528)	0.145 3 (0.493)
常数项	-10.917 6 *** (-3.908)	-8.278 2 ** (-2.435)
样本量	8 292	9 540
组间 <i>R</i> ²	0.442	0.509
年度固定效应	是	是
公司固定效应	是	是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 研究结论

(1) 增值税税率下调促使企业的雇佣规模增加了约 3.0%，相当于每家企业平均扩大 172 个就业岗位。

(2) 区分劳动雇佣结构的进一步分析发现，增值税税率下调显著增加了研究生学历以及研发岗和管理岗的劳动力雇佣规模，劳动雇佣结构整体呈现出以高素质、高技术人才为主的特点。

(3) 机制分析发现，增值税税率下调通过增加企业经营性现金流、缓解内源融资约束以及改善银行信贷获取、缓解外源融资约束共同促进企业增加雇佣。

(4) 异质性分析发现，增值税税率下调对企业雇佣规模的扩大作用在税负转嫁难度较大、获取银行贷款难度较大以及数字技术密集型企业中更明显。

(二) 政策建议

(1) 调低增值税税率能够显著改善企业现金流状况和融资状况，进而促进企业吸纳就业并优化劳动雇佣结构，建议在“十五五”期间继续优化

增值税税率结构，适时推进增值税税率三档并两档，充分发挥税制改革对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支持作用。

(2) 政府工作报告(2025)提出，加大各类资金资源统筹支持力度，促进充分就业、提高就业质量。资金是企业进行劳动力投资决策时的关键限制因素，融资约束会显著抑制企业劳动雇佣。建议在“十五五”期间推动构建金融有效支持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的体制机制，如通过制定政策引导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贷行为，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改善企业的信贷待遇；企业应完善企业制度、健全治理结构、提高偿债能力。

(3) 政策制定者应充分认识到增值税税率下调对企业劳动雇佣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企业的税负转嫁难度、获取银行贷款难度和要素密集度会显著影响改革成效。因此，为了实现改革效果最大化，未来可考虑优先调整税负转嫁难度较大、获取银行贷款难度较大以及数字技术密集型行业的税率，以提高增值税税率改革的精准性。

(4) 当前我国税收政策种类繁多、专业性强，税收征管机关应不断优化纳税服务，将减税降费政策及时、准确地传达给纳税人。同时，税收征管机关应做到应收尽收，禁止收取“过头税”、收紧税收优惠享受条件，从而为企业切实享受政策红利、吸纳就业奠定公平环境，确保企业感受到税收政策“温度”。

参考文献：

[1] 陈晓光. 增值税有效税率差异与效率损失:兼议对“营改增”的启示[J]. 中国社会科学, 2013(8): 67-84.
[2] 刘柏惠, 寇恩惠, 杨龙见. 增值税多档税率、资源误置与全要素生产率损失[J]. 经济研究, 2019, 54(5): 113-128.
[3] 郭庆旺. 减税降费的潜在财政影响与风险防范[J]. 管理世界, 2019, 35(6): 1-10.
[4] 胡海生, 王克强, 刘红梅. 增值税税率降低和加计抵减政策的经济效应评估:基于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研究[J]. 财经研究, 2021, 47(1): 4-17.
[5] 孙正, 陈旭东, 雷鸣. 增值税减税提升了中国资本回报率吗[J]. 南开管理评论, 2020, 23(6): 157-165.
[6] JACOB M, MICHAELY R, MÜLLER M A. Consumption taxes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 [J].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19, 32(8): 3144-3182.

- [7]刘行,赵弈超. 增值税税率下调、税收成本权衡与企业盈余管理策略[J]. 经济研究, 2024, 59(8): 77-94.
- [8]曹越,彭可人,郭天泉. 增值税税率调整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J]. 中国软科学, 2023(2): 214-224.
- [9]崔惠玉,王宝珠,王伟同. 降低增值税税率能够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吗[J]. 会计研究, 2023(2): 133-148.
- [10]刘行,叶康涛. 增值税税率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来自股票市场反应的证据[J]. 管理世界, 2018, 34(11): 12-24.
- [11]范子英,彭飞. “营改增”的减税效应和分工效应:基于产业互联的视角[J]. 经济研究, 2017, 52(2): 82-95.
- [12]陈烨,张欣,寇恩惠,等. 增值税转型对就业负面影响的CGE模拟分析[J]. 经济研究, 2010, 45(9): 29-42.
- [13]崔小勇,蔡昀珊,卢国军. 增值税留抵退税能否促进企业吸纳就业?:来自2019年试行留抵退税制度的证据[J]. 管理世界, 2023, 39(9): 15-38.
- [14]何慧华,陈婧,于雪航,等. 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劳动雇佣效应:基于2018年财税70号文的证据[J]. 会计研究, 2024(2): 182-192.
- [15]方红生,赵乐新,赵明瑶,等. 企业所得税税率变动的劳动雇佣效应[J]. 财经论丛, 2025(2): 5-17.
- [16]潘凌云,董竹. 税收激励与企业劳动雇佣:来自薪酬抵税政策的“准自然实验”[J]. 统计研究, 2021, 38(7): 100-111.
- [17]王跃堂,王国俊,彭洋. 控制权性质影响税收敏感性吗?:基于企业劳动力需求的检验[J]. 经济研究, 2012, 47(4): 52-63.
- [18]余明桂,王俐璇,赵文婷,等. 专利质押、融资约束与企业劳动雇佣[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2, 39(9): 70-93.
- [19]BARROT J N, NANDA R. The employment effects of faster payment: evidence from the Federal QuickPay Reform [J]. Journal of finance, 2020, 75(6): 3139-3173.
- [20]邵敏,包群,叶宁华. 信贷融资约束对员工收入的影响:来自我国企业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J]. 经济学(季刊), 2013, 12(3): 895-912.
- [21]孙伟增,郭冬梅.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影响:需求规模、结构变化及影响路径[J]. 中国工业经济, 2021(11): 78-96.
- [22]余明桂,王空. 地方政府债务融资、挤出效应与企业劳动雇佣[J]. 经济研究, 2022, 57(2): 58-72.
- [23]BENZARTI Y, HARJU J. Using payroll tax variation to unpack the black box of firm-level production [J].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2021, 19(5): 2737-2764.
- [24]张三峰,张伟. 融资约束、金融发展与企业雇佣:来自中国企业调查数据的经验证据[J]. 金融研究, 2016(10): 111-126.
- [25]COASE R H.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J].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60(3): 1-44.
- [26]KOSONEN T. More and cheaper haircuts after VAT cut? On the efficiency and incidence of service sector consumption taxes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15, 131:87-100.
- [27]尹恒,迟伟栋. 增值税减税的效应:异质企业环境下的政策模拟[J]. 中国工业经济, 2022(2): 80-98.
- [28]叶永卫,李佳轩,刘贯春. 续贷限制、流动性约束与稳就业:基于《贷款风险分类指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J]. 财贸经济, 2023, 44(1):83-98.
- [29]刘行,赵健宇. 税收激励与企业创新:基于增值税转型改革的“准自然实验”[J]. 会计研究, 2019(9): 43-49.
- [30]宋弘,封进,杨婉彧. 社保缴费率下降对企业社保缴费与劳动力雇佣的影响[J]. 经济研究, 2021, 56(1): 90-104.
- [31]CORNAGGIA J, LI J Y. The value of access to finance: evidence from M&A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9, 131(1): 232-250.
- [32]GOODMAN-BACON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with variation in treatment timing [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2021, 225(2): 254-277.
- [33]CENGIZ D, DUBE A, LINDNER A, et al. The effect of minimum wages on low-wage jobs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9, 134(3): 1405-1454.
- [34]CAGGESE A, CUNAT V, METZGER D. Firing the wrong workers: 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labor misallocation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9, 133(3): 589-607.
- [35]赵胜立,方慧. 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与企业数字化转型[J]. 世界经济, 2025(1): 30-59.
- [36]刘行,陈澈. 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对企业的影响:来自股票市场的初步证据[J]. 经济研究, 2021, 56(3): 100-115.
- [37]刘行,赵健宇,叶康涛. 企业避税、债务融资与债务融资来源[J]. 管理世界, 2017(10): 113-129.
- [38]鲁桐,党印. 公司治理与技术创新:分行业比较 [J]. 经济研究, 2014, 49(6): 115-128.
- [39]FANG H, BAO Y, ZHANG J. Asymmetric reform bonus: the impact of VAT pilot expansion on China's corporate total tax burden [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7, 46: S17-S34.

(本文责编:希文)